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五七）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五期 ——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1a）

【往事非烟】	读一本淘来的“文革”日记	老 愚
【峥嵘岁月】	省总工会武斗	叶曙明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八）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非烟】

读一本淘来的“文革”日记

• 老 愚 •

◇ 文革前夕的“进步青年”

这是同事从北京地摊上淘到的一本36开的日记本，由公私合营上海文化纸品厂生产，标价35元。150页的条纹本，主人写了三分之二，字数在十万字左右。日记始于1966年2月22日，终于同年10月23日，历时八个月。较长的停顿在3月2日至5月20日之间。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手太懒”。日记完整，无一页破损或撕扯。我猜测，这本日记以废纸出售，后被有心人拣出，最终流入收藏市场。

日记主人是北京化纤学院大一学生，一个有文艺爱好的青年，与中学同窗有过一段朦胧情愫，但越来越浓烈的革命氛围改变了一切。读这本详实的文革日记，可以看到中共建政后是如何通过洗脑，将渴望进步的青年变成革命暴民的。当下中国正由这样一代喝毒奶长大的人掌控，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们的权力人生词典里没有妥协、认错、宽容这些词。写日记的人若健在，正处于66岁左右的权力之巅。

若无意外，主人与及日记里出现的同龄人也当健在，故隐去日记主人的真实名字，仅以H

代替。与其相关的人，也以其姓氏声母指代。若当事人凑巧看到这篇小文，请与作者联系。

阅读这本笔迹清晰的日记，我有重回历史语境的兴奋感。一个渴望上进的男性青年，在1966年这大半年的所思所想所为，完整地描绘了时代的图景。一个非团员如何完成通过灵魂深处的思想改造，“进步”为一个狂热的革命造反派，外出串联，南下广州，西至新疆，寻找革命的路径。他时刻想着被组织认可，积极表现，最终进入主流。他加入“莽昆仑战斗队”，为的是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将矛头指向化纤学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即照搬苏联教育模式，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思想控制是其基本特征，每一个渴望在社会上立足以及有所作为的青年学生，都不得不进行自动洗脑。渴望尽早被组织接纳，成为“革命接班人”，几乎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本能。

日记中的主人公，天然地被革命所裹挟，立志做一个毛泽东的好战士。他几乎是自觉地阉割了独立思考的天性，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指令，从中获得崇高感和人生价值。

身为大学生，他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感恩之心：“我之所以上大学，完全是由于党的培养，自己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中，上大学在过去又怎么可能呢？既然上了大学，就要好好为无产阶级争口气。”

按照那时的理论，毛泽东著作是改造世界观的武器，所以，对“毛选”应有的态度反复体现在日记里：开篇便是效忠——“雷锋、王杰、麦贤德、焦裕禄等英雄，他们之所以那样忠于革命忠于人民，以至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都是由于他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不仅可以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而且可以解决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主席思想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在“又得到一本毛选”后，H写道：“红色的皮里印着句句真理，自己看后爱不释手。”

他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学“毛选”的原则：“不图数量多，而要见效，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

接下来，便是活学活用的例子：

测定钢样中锰的含量，准确度差，他通过学习《关于重庆谈判》中毛的论述：“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找到三个原因：资料不充足，缺乏研究；耐心不够；时间掌握不准确。

食堂就餐，发现同学丢的菜和饭粒，他立即和班委会干部沟通，在黑板报上撰文批评，并“找了毛主席语录让大家对照着学”——“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然后反省自己的不节约行为：用水不注意，用纸不注意，用粉笔不注意等等。

H应该是体育委员的角色，他负责统计班里同学的长跑情况。那时候，长跑往往设定目的地，比如从出发地到首都北京、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什么的。他们班一天要跑28公里，当同学们问他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时，他随口答出：2000公里。后来，有人建议用尺子在地图上量，H量后发现仅有600公里。这样，再用两周时间，他们班就可到达目的地。要是不量，就会糊里糊涂跑下去，颇感惭愧的他找到了“毛选”：“胸中要有数，这就是说对情况对问题要注意它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

日记里的另一个主题是要求进步，加入共青团组织。

H有自觉地站队意识，他把自己看作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时时刻刻为组织考虑。他对班里的体育锻炼现状不满，认为三分之一是随大流的，比较落后的“只限于早操锻炼二十来分钟，下午不锻炼，推一推动一动”，属于“落后分子”。他决心按照毛选的教导，“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在班内形成广泛的自觉的为革命而锻炼的高潮”。他如此表态：“我不是一个共青团员，但是我要以一个共青团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处处，事事，时时都要严格地要求自己，在任何工作中起骨干作用，起带头作用。”

在参加共青团员迎接“毛选”仪式时，他感觉自己也和我们一起宣了誓，他发誓：“只要争取组织帮助，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做好工作，朝高标准要求自己，为共产主义踏踏实实地干一下，一定会加入组织的。”接下来的表态，虔诚里有点儿悲壮色彩了：“思想改造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自己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干到底，干到老，干到死。自己决定，以后把主席语录天天放在身边，随身带着有空儿就看，好好地利用这一武器改造主客观世界。”

时隔两个月后，他在5月20日的总结里这样表述自己在政治上的进步：

- 一、通过学习焦裕禄和他对比找出自己的差距；
- 二、对照学习毛选，有利于改正缺点，有利于进步；
- 三、通过十天的劳动，培养了自己不怕脏不怕累的劳动观点；

四、通过批判吴晗和“三家村”的文化大革命，对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认识，对欣赏文艺作品有了启发，应政治与艺术两条标准去衡量其好坏，明确了突出政治是一切的根本，明确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

- 五、要注意艰苦朴素，尽管自己没有有意识地追求穿什么，可给同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在这份总结里，他特别谈到自己文艺生活的消失，唱歌，乐器，全生疏了，“我的文艺生活就这样渐渐地消失了吗？”他认为是环境造成的，“我相信毕业后还会在文艺上活跃起来”。

他用了很大篇幅讲述与一个女同学的思想斗争。本属中学同窗，因爱好文艺和各自的小资情调相互走近。按照当时的阶级分析法，她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虚伪，不愿跟大家交心。他们因为交换日记而发生冲突，一个渴望革命的男子与一个讲究生活格调的女子，因为同学朋友和组织的介入，两人的“私事”变成了公事，最终水火不相容，H看穿了“虚伪的小人”，但在组织的帮助下，决定好好帮助那个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子“进步”。

中学同学相继入团甚至有的已经申请入党，H不免有点着急：“自己是落后了，不仅落在他的后面，而且落在许多人的后边，这样下去，不难设想会落到时代的后边，自己以后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做个又红又专的学生。”

日记给出的时代场景就是这样，每个人都不由自主进入革命的搅拌机，渴望被新政权认可。出身革命阶级的人，天然地对这个制度感恩，并跃跃欲试想做时代的主人。被革命阉割的青年，丧失了反抗意愿，他们的热情都被用来烧开了革命大锅里的水，烫死了敌人，同时烫伤了自己。

一个高亢、枯燥的时代，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交出了灵魂，把自己变成听话的玩偶，甘心情愿成为最高权力斗争的小卒子。

◇ 与人斗其乐无穷

正因为H非叱咤风云之类的角色，其心态和行为才更有标本价值。

H是一个希望推倒既定秩序、跃入历史主航道的“社会主义新人”。

本因渴慕小资气味而亲近，终因性格和阶级冲突而抛弃第一个准女友，他以为自此完成了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进化。从此，乐于在被新政权裁定为“改造对象”的同学面前炫耀自己的阶级出身，他明白自己的敌人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后代。革命给予H翻身做主人的勇气，原本自卑的心态一变而为优越感，他自觉可以斜睨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人。

他的一系列举动无非是要证明，这个时代必须重整秩序，将现有的人际层级颠倒过来，而自觉只要跟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就能成为人上人。效忠领袖是为了获得利益，他非常明白。所以，他的自始至终浓烈的效忠般的表态，发自企求“翻身”的内心，绝不可以简单的投机视之。他凭借生存的本能抓住了机会，这也是他唯一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毛泽东是一步步掀开自己的底牌的。而H是凭灵敏的嗅觉嗅出了正确的方向。

从批判“坏文章”开始，他逐步走上了一条推翻旧秩序的道路。

1966年6月2日，聂元梓等七名北大学生造反后，H所在的化纤学院学生“纷纷写信给北大同学，纷纷写大字报”，“一天就写了八百份”，揭露本院的错误路线，他也写了一份，并贴在校园里。“文化大革命从现在起，在本院才算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在这次运动中应走在前头”。

第二天，做物化实验的他，见同学都在写大字报，便“坐不住了”，写信给《人民日报》，系统揭露学院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存在的“方向性”问题。“从上午打底稿至下午四点钟才结束，共写了十三页作文纸”。他在给几个同学看过后寄出。“同学们的革命热情更高了，仅今天又张贴了几百张大字报。同学们纷纷要停课，停考，开车去北大声援北大的同学。”

他注意到教师们没有行动。“也许是他们有顾虑吧！但是时间一长，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一定会站出来的。”

教师第三天就站出来了，令H没想到的是，站出来的教师在大字报里却认为应把斗争锋芒指向院外的“黑帮分子”，“阻止同学揭发院内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是不革命的”。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下令改组北京市委，彭真、刘仁、宋硕、陆平等被打入冷宫。听到新市委的指示，H感叹：“毛主席真是伟大”。“我一定打消顾虑，给院领导提出资封修的坏东西”——原文如此，意思自可明白：他要揭露学院领导的封资修行径。

第五天，食堂里也贴出了许多大字报。“看了后真是大快人心”。见辅导员揭露系领导黄某的大字报“讲得不深不透”，H决定“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写到现在”，他执笔从十二点写到下午二点半，一直写到吃晚饭才算完成，罗列了二十八条罪状。“尽管比较忙，但心情是愉快的”。

第六天，纺织工业部派来“工作组”，开完欢迎会，“同学的热情更高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胆揭发，敢于革命”。

第七天，一些教师贴出大字报，向造反学生发难，“同学们简直就要把几个老师围起来动手了”，经工作组调解才解围。H断定这些教师中有“保皇派”，“他们一定会被揪出的，胜利一定属于正义的人民”。

第八天，H开始怀疑“工作组”的立场。因为他们不在学生食堂吃饭，也不和学生住在一起。他在琢磨，如果“工作组”不能满足造反学生的要求，“就给市委或党中央去信”。

三天后，他写信给市委第一书记，揭露学院的问题，并把信送到市委。

这天下午，邮电学院和政法学院的宣传队来校内动员学生造反，一徐姓教师当场揭发化纤学院是黑帮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控制的天下，呼吁解散党委成立新支部和革命委员会，让大家听他的，“同学们以身体保护他”。

自认都是“左派”的参会者，协商达成二个意向：一班派一人去新市委请示派新工作组；组成护校队，保卫学校。

H自然去了，他正好把写给市委第一书记的信送过去。

事情就这样升级了。等他回来，“听说右派打了左派，骂左派，给左派贴了许多大字报”。指责“左派”阴谋推翻党委，原来是徐姓教师交待的。H也被指为“黑帮的打手”。H哀叹“‘左派’处于低潮，一年级、二年级几乎没有发言、写大字报的，发生了沉默。”

第二天上午，H发现那些“‘右派’、‘保皇派’”“趾高气昂，走路都抬着头和前两天截然不同”。

“前市委是修正主义的，我院肯定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又不引导揭发，怕揭发自己，转移斗争的锋芒，怕引火烧身，这就证明有问题。”下午，在学院王部长的定性讲话后，“左派”们立马扬眉吐气，把所有火力集中对准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二年级指导员扬祖伦——“大字报一张一张地贴了许多，把他的名字画叉，有的把他的名字倒写，真有意思。今天一天的大字报完全是针对院领导的。”

H当天又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揭露团委的检查是转移视线；一张揭露其检查书故意在“主席思想”前不加“伟大”二字，属于贬低领袖的罪行。

这天晚上，到了九点半，H还是想上楼看大字报。却看到了同学们斗扬祖伦的场景。“人越来越多，问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终于说出错话：‘我们怕群众革命。’大家继续问：‘怕革谁的命？为什么？’他停了十五分钟也答不出来。后来工作组的同志来了，让扬反省。大家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胜利了。扬的脸黄了。后来把他带入小屋反省。”

接下来的几天，便是一连串的批斗。

“上午斗张琳，她的确够狡猾的了。最后把她送到小屋里反省。让她别靠窗子，以免跳楼，她却大声说：‘共产党人不跳楼！’同学大骂她不要脸。”

“上午同时斗了陈佩文和兰院长，结果和张琳一样顽固，看来‘保皇派’内部有攻守同盟。”

“今天一天过得比较平静，没有大斗几个人，只是在下面分小组斗过几个人。这几个人的

态度也是不老实。”

H还给班团支部书记写了大字报，指其为“保皇派”，目的是“给她一个压力，让她揭发问题。”

在这样的气氛里，当权派成为学生公然取笑的对象。学院党委侯书记回校，造反学生“伏在窗子上高呼口号”“夹道欢迎”，侯“自己扛着行李一摇一晃”狼狈地回到住所，学生不许他乘汽车。

“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它，它就斗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这是H在6月21日抄在日记本里的大字报内容。

6月24日下午，六个班一起组织斗李姓女教师。H在日记里说，会场布置得如同法庭，“这次打倒了她的威风，她老实了一些，交待出一点儿问题。”有人用黄纸做了一面旗子，上书：李某，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逼迫她念一遍，然后打着旗子离开。

晚上，群情激奋的学生决定斗扬祖伦，H一个把他带到教室。造反者提出一个一个的问题，他全不回答。最后答应第二天下午二点半回答。造反学生做了一面旗子，上书：我是黑帮分子，顽固不化。逼迫他念了一遍，打着旗子离开。H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的几次斗争都是比较顺利的”。

造反学生决定用发明的旗子打掉院领导的威风，他们做了许多面小旗子，上边写满各类人身侮辱的话，“一群同学等着，来一个黑帮分子发一面旗子，让他们高举旗子去食堂吃饭。”

有些教师看不下去了，招贴了一封公开信，指出谩骂、画漫画、打旗子等做法与中共的方针政策相违背，应该改变。H对此反应激烈：“对敌人就应该施行专政，革命是暴动，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工作组勒令教师收起了大字报。

6月27日，造反同学在宿舍传阅“黑帮分子”的日记本，H对其中的男女关系颇为好奇，“我也看了女方的日记，他们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出去谈心。”

在6月29日，H写道：“这一周以来没有斗过一个人，只是收集材料，材料充足以后就给他们黑帮分子定案了。”

7月1日晚上，学院召开庆祝中共诞辰大会。党委负责人提出：主要矛头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也要整，但要放在后面；对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旧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团结他们。他还指出：做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最根本的还是学好主席思想。

H对“做革命接班人”极有兴趣，“我应该在这次运动中接受考验，接受锻炼，在斗争之中逐步地向五个条件进军”。“今天是党的四十五周年纪念日，自己一定在今后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读主席的书，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H的生活除了吃饭、睡觉、游泳，就是“革命”。下车间实习都是敷衍了事，也没人敢管他们。在这个发烫的夏天，他的一切都改变了。

◇ 在夺权的漩涡里

毛泽东为前北京市委定案，斥责其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和平演变”。7月3日，中共喉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称：发动群众，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伟大的创举。

H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让我在新的一周里，好好地遵守作息制度，好好学习社论，积极参与讨论，把自己的一切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去吧！”

第二天，他就投身到为黑帮定案的斗争中来。首先核实党委副书记侯希如的材料，在H看来，侯跟前北京市委官员宋硕关系密切，“足足够个黑帮分子，他是党内十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第三天，讨论副院长郭启明的材料。罪状有“依靠学者、权威办学”，“办豆腐房，让资本主义经济复辟”，“贪、懒、馋他都占，歪曲主席指示也有他，总之，他足够个黑帮分子的”。

第四天，围斗教务处代理处长高思渊。“高是现行反革命，出身恶霸地主，他的父亲被镇压，他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为他父亲翻案。有意识地破坏‘四清运动’，不让群众都地主。他真正是钻到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我们一定要全院革命师生共讨之，把他斗臭斗垮。”

在当天晚上的青年同学“生活会”上，H总结自己学习“毛选”的收获是：“加强了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一个人、一件事，不能只看这个人的外表和做事，而应看他的阶级立场，看他的本质。”

第五天，为女院长定案。有人说她糊涂，是跟别人跑的。H认为，“她是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对抗这次触及人类灵魂的革命。”他给她罗列的罪行有：在“‘毛选’讲用会”上讲黑话，将“四清运动”神秘化等等。这天下午，为高思渊定性：阶级敌人，专政对象。

H兴奋地写道：“很长时间没有写大字报了。今天晚上和Z一起用主席的话分析高的事，写了几张。以后自己应抓紧时间写大字报，带着主席思想去写大字报，去看大字报。”

第六天，讨论宣传部副部长扬祖伦的材料。扬实干肯干，对工作兢兢业业，被一些同学称为焦裕禄式的干部。在H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出身地主家庭，没有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扬的阶级立场并未改变，“怎么能这么快入党，又当上院宣传部副部长？”

H在当天的日记里，还写了对组织部部长张琳堕落一事的感想：出身工人家庭却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在于，“不注意思想改造，不学毛著。”

在这一段时间，H还看了一系列“革命电影”。第二次看完《东方红》，他写道：“进一步了解我们的党确是光荣、正确、伟大的，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完《罪恶的地主庄园》《不忘阶级苦永记血泪仇》和《夺印》后，他表示非常气愤：“在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与压迫是相当残酷的，如果不是解放，决不会有现在的面貌，而我也上不了大学，这些都是新社会的好处。”

7月12日，H早上五点起床，七点参加斗争高思渊大会。他觉得斗垮斗臭了敌人，“他从七点一直站到下午二点，当他有些不老实时，群众大声斥责他，让他低头，用手按他脖子让他低头。结果他的威风一扫而光。”当天下午，H所在班“出身贫下中农、工人和革命干部的同学”一起开座谈会，H在会上表示：“一定要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主席

的好学生，永远革命，永远向前，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7月16日，H一天都在和两个同学写批判侯希如的材料，“文章写得够长的，铺的面也够宽，侯的各个方面几乎全批了。”

7月19日，H参加化工12班的“毛选”交流会，他的感触是：要善于抓自己的活思想，从小问题上看出大事。

从7月23日开始，一连三天，他参加了批斗侯希如的大会。第一天有32人发言，第二天27人发言，第三天也是27人发言。“我院对当权派的斗争打响了第一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真正体会到主席讲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几天后，当参加四清的同学返校，“打”的革命暴力便自然发生了：返校学生中有一些人所谓的“小牛鬼蛇神”，立刻就给戴上牌子，不服气的，就大声呼口号。晚上，造反学生便动手打“黑帮分子”，“打了也就打了。以后注意点就是。但归根到底还是黑帮分子他们自己造成的。”

在火热的革命之余，H也有自己的心事。他看上了女生L，“她对我如何我是不知道的。”这个傲气、有小姐脾气的女子，H觉得很难接触，便劝自己“不可胡思乱想”。但他又时常想起人家来。经过一番打探，他知道了其确切情况：出身比自己好，家庭比自己优越，其母亲经常来信帮助她“进步”。有一件事颇有意思：父母遵嘱将奶奶土葬，她反对“搞封建迷信”，公开抗议。他原以为她是一个“玩玩闹闹不考虑进步的人”，现在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改变尤其大”“已经申请入党”。而“她的性格太要强，个人意见第一”，他权衡再三，决定关闭多情的心扉。

另一件事，说起来非常小，家里寄来十元钱让他买一条秋裤，他却犯难了：是买一条好裤子呢，还是买一套“毛选”四卷？“买裤子可以穿，因为自己浅色的裤子少，而买‘毛选’可以看，可以改造思想。”第二天，问题就解决了：他决定买“毛选”。“穿一条好裤子没有什么用。”

这段时间他看的唯一一本文学书籍是《欧阳海之歌》，“要用零星时间看一遍，以后再仔细地读，真正地受到教育。”

他也有寂寞的时候，北京同学周末回家，宿舍里孤身一人时，他难免想起家乡父母，他只好用睡觉抵御革命的寂寞：“晚上很早就回宿舍去了，心里乱得很，很早就准备睡觉。”

◇ 毛泽东的“红卫兵”

毛泽东决定撤走刘少奇集团向各单位派驻的“文革工作组”，亲自指挥这场夺权革命。他接见“文革”积极分子，鼓动成立“红卫兵”组织，并自认“总司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起来了，原有的政权体系迅速瘫痪，进而摇摇欲坠，中国进入极端恐怖的暴力革命时期，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

这年夏天，官方做出决定：暑期不放假，让被煽动起来的学生继续“革命”。

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被迫派车送造反学生去各高校参观“取经”。H去的是北大，除此之外，他还四处打探，感受“革命”氛围。他在北大、二外、广播学院等校看到热火朝天的场面，“斗争是激烈的”“激烈的大辩论”，“大字报贴的很多，对黑帮分子管得真严，劳动改造进行得很好”。也看到造反阵营的分裂，他表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勇敢地站在革命的一方，

不怕孤立，不怕扣帽子，不怕讽刺、讥笑。”

听说外地群众“革命”起不来，天津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激进的造反学生来北京观摩。H非常着急：“实在想到外地宣传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毛泽东思想。”

三胡下台（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团中央改组，H在团中央门口看到“人们纷纷高呼口号、敲锣打鼓前来祝贺”。“他们企图把共青团办成全民团，不实行阶级路线，歪曲‘重在表现’，与毛泽东思想唱反调。”

纺织工业部却是一副温吞水的气氛，“贴的大字报倒是不少，可是口气都是和风细雨的，给部长、党委提意见都是商量的口吻。”H很不满意。由此联想到化纤学院革命的状况，H不免着急起来，“回校后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以后还是抽出时间写一些大字报，学毛选，只有这样才能把运动搞好。”第二天，他发现讨论问题和写大字报的人多起来了，感慨道：“前几天冷冷清清的形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H去一所中学查看中小学生对斗争情况。见他们斗争技术拙劣，无杀伤力，便亲自出马，“我和几个同学帮他们斗了一个右派分子，结果把他问住了。大家呼喊着他拖进小屋检查去了。”H对中小学生的“革命”暴力持支持态度：“小学生打人很厉害，不过这些小黑帮也值得一打。”

在这之前，官方推出了一个“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刘英俊，他的人生最高目标就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并为之献身，他为救六名儿童挺身拦惊马而死。H在学习其事迹后写道：“我应该学习他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也出身于工人家庭，自己也要带着无产阶级的感情去读主席的书，争当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H已经具有相当强烈的阶级意识，他赞美“讲出身讲成分”的社会氛围：“我们一提到出身就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们的条件就是好。我们对党对毛主席就是比那些出身不好的人热爱得多。”他宣称：“我们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扬眉吐气的社会。”他明白这场大革命就是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必须把握好，告诫自己要“大造资产阶级之反，做红色的接班人。”

“毛选”发行的这一天，他和造反学生激动万分。班里只让两个人去新华书店拉货，他硬是钻进汽车，“一路上敲锣打鼓”，书店门前“人们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拉到学校，“门外就有许多同学欢迎，大家高呼口号，穿着各式民族服装，唱歌跳舞，整个化纤学院沉浸在欢乐之中。”在大礼堂举行发毛选大会，众人“纷纷表决心”，“我拿到了毛泽东选集，我是多么高兴呀。今后一定要带着阶级感情学习一辈子毛选，干一辈子革命，永远革命永远向前！”

在学院选举“文革领导小组”的过程中，他左冲右突，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愿：一定要把出身好、真心革命的人选出来。

8月18日，是H最幸福的一天。他参加百万学生大游行，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泽东。

“今天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日记这样开头，他们凌晨三点前往天安门广场，满天星斗，有人唱起歌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他们渴望见到领袖，但不知道伟人能否参加自己的集会。七点钟，扩音器里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广播员宣布毛泽东来了，于是，“‘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无数大鼓齐鸣，乐队高奏《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彪代毛泽东向大家问好，周恩来讲了话，造反学生代表发言，然后游行开始。毛泽东悄悄闪了。

“‘刘一主席，我们一要一见一毛一主一席!’”在“红卫兵”的哀求声中，《东方红》又起，毛泽东出来了。“一个身材魁梧、健壮，满面红光的巨人出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我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用力地晃动红色语录本。那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我的嗓子喊哑了，再也喊不出来了。”“我太幸福了，我太幸福了！”

当天晚上，学院开庆祝会：一是见到了毛泽东，二是革命委员会成立。“看吧，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又来到我院了！”

但他还不明白，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究竟是要干什么。请看他对城楼上几个大人物的描述：“主席又向东走去，走到最东角处，手扶栏杆向远方望了望，接着又用手拿着帽子向东方的街道上晃着，一会儿又拿着帽子向观礼台上的红卫兵摇动，招手致意。……只见林彪同志从东边走了回来，走到城楼中间。我们发现刘主席站在城楼中间，他老人家穿着一身灰，左臂上也同样挂着红袖章，同学们高呼‘刘主席您好！刘主席，您好！’林彪同志不知和刘主席在说什么，反正是用手指着队伍，用手比划着。周总理穿着半截袖衬衣，左臂上同样挂着红袖章。他看了看表，用左手挥动着，意思是让我们向西走。”

这是几个人最后一次亲密地同处一个时空，很快，刘主席——刘少奇就要被当做“叛徒内奸工贼”揪出来，与他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团队一起接受暴力处置。天无二日，只能有一个主席，主席就是毛主席，红太阳就是毛泽东。

见到毛泽东的第二天晚上，学院出身“工农革干”的子弟宣布成立“红卫兵”。“我要做一辈子红卫兵，永远保卫党中央，永远保卫毛主席！”激动万分的H想到本班文革领导小组里还有出身不好的人，立马要求改选，纯洁阶级队伍。“一定要把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我们手里。”他的鼓动奏效了。

8月22日，学院“红卫兵”组织正式成立。首批加入的有十三人，全是其他两个班的。“红卫兵”只许“红五类”出身的人参加。H不免有点失望，他原以为出身好的全部可以变成红卫兵。但他随即表态，“自己努力争取迅速加入自己的阶级组织”。造反派还做了一件事：赶走了理发“黑店”老板，成立“革命理发小组”。H积极加入这个小组，并表示要以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榜样，精益求精、热忱地为同学服务，做一个“革命理发员”。

接下来，H踏上了“大串联”的征途，远赴兰州、乌鲁木齐、西安、武汉、广州等地，搜集材料，鼓动造反。“大串联”归来，他便成为一个干劲十足的“红卫兵”战斗队成员，正式进入风云变幻的革命大舞台。

◇ “大串联”的日子

由一大批狂热青年学生把北京的革命做法输出到外地，从而搅动整个牌局，是毛泽东集团的战略部署，由此产生了无法无天的“大串联”运动。

H自觉加入其中。他先是和本校的造反派西征兰州、乌鲁木齐，然后又南下广州，在搜集材料、鼓动造反之外，顺便浏览了大好河山，他还特意参观了韶山毛泽东故居。返京后，他更狂热地投身造反运动，自建名为“莽昆仑”的红卫兵组织，成为勇敢无畏的革命战士。

“我们将要去西北了！”8月22日，H从北京站出发，“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他以“红卫兵”的标准要求自己，打算在西北表现一番。

他们原以为到兰州后会被人揍一顿，因为自己是来煽风点火推翻现政府的，没料想竟然受到了礼遇：“住的吃的蛮好”，他们住进了铁路局招待所。

当地正在揪“裴马黑帮”（中共甘肃省委负责人），火车站周围贴满标语。H刚入房间，就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厚叠传单。当天晚上，一个来自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工人前来接洽，希望北京的“红卫兵”去所里革命。接下来，他们便进入角色，演出了一场深入虎穴的好戏。

按照H的叙述，这个所里“大部分是资本家出身，资产阶级意识很浓”，明知有困难，他们还是决定帮助研究所群众造反。这里冷冷清清，“行政楼里大字报少得可怜”，“只看见几个学生在贴大字报”。H给学生讲北京的斗争情况，给他们鼓劲。又去问所长要纸、笔和墨：“一进屋就大嚷一气”，所长被迫答应了。他还勒令所长两日之内撤换屋内的“资产阶级一套”陈列，换上毛泽东“语录”。

H联合北京航空学院来的几个造反学生，与工人谈话，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复员军人谈话，收集当权派罪证。决定先写大字报，“点一把火然后再说”。

一张“告全所职工书”，一些语录社论摘录，“我又写了两张命令书”。他们质问研究所负责人，命令其回答问题，然后写成大字报。在职工大会上动员，“斗争目标应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天，H启发一个写过大字报的老工人，“他慢慢地觉悟了”，答应回去组织工人共同对付当权派。他们还质问党委书记，逼迫其回答问题。几个女工要成立造反队，他们表态支持。他又参与包装组“文革领导小组”筹委会委员选举，发动工人推翻原来的选举结果，因为“许多都是当权派”。

几天后，他们弄到了研究所负责人的“材料”，准备以“公开问答”的形式召集会议，把火烧起来。“如果保皇分子出来嚷嚷，我们就制止，就以主席语录、人民日报社论压他。”他们公布了负责人的“材料”，“大家看后很生气，很气愤”，该所负责人“有些慌了，工人们许多要讲话”，H兴奋地写道：“看起来这个所的运动要起来了！”

在这期间，H还去甘肃师范大学串联，“到处冷冷清清”，见文革办公室摆设沙发茶几什么的，便“很生气”，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门上。“这个学校真是世外桃源，难道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没有国家的命运了？”

他最欣赏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革命形势：大字报贴得很多很多，热火朝天，团结一致。尽管受到当权者和农民的围攻，“他们为了捍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勇敢地战斗着”。

有一件小事或许值得一提：几个铁三中的女同学要帮他改名字，H觉得“永红”好，但她们认为应“强有力，不要软的”，以“永毅”替代“永善”，H觉得“不太革命化”未采纳，名字就未改成。

在新疆，造反派被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也称为反动谬论”，清华大学造反派写给自治区一把手王恩茂的公开信，被称为大毒草，满街的广播车要人们警惕北京来的“红卫兵”。H在散发《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要支持革命学生”的传单时，还被当地“红卫兵”揪住质问。广场上到处是辩论会，而且，

不断有人来与他们辩论，“他们辩论时极不讲理的，简直是人海战术，以势压人”。H觉得“这里的‘文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人民日报》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发表后，形势遽变，北京来的“红卫兵”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决定发动反击：在9月13日八点半去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贴大字报，“一下子把广场贴满，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H他们连夜写了一百多张大字报，“看吧，明天准会有好戏看！”

第二天，他们人手一册“语录”、一卷大字报，“高唱革命造反歌和鬼见愁歌曲”，列队奔赴广场。进入广场后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色堡垒党中央！红色司令毛主席！炮轰司令部——区党委！”“整个广场成了我们的了！大家一起贴大字报，一下子把整个广场贴满了。一个红卫兵战士吹起嘹亮的进军号，红卫兵立即集合在检阅台下面。大家高唱革命造反歌。有人在检阅台上贴出巨幅标语：红色堡垒党中央！红色司令毛主席！绝对如此！”

为了证明自己的行动深得人心，H特意记了一件小事：在广场上，一位家庭妇女塞给他一个信封，里面装了二元钱和一封信。他执意不肯收，但当她说出“等到胜利的一天，再找你们去。”后，H感动地收下了。钱是她让他们买纸写大字报用的。

9月15日，又来了四百名北京“红卫兵”。H觉得当权派试图拉拢这些“不明真相”的新人，以此打击“老红卫兵”。广播车又出动了，宣讲诸如“九三事件”、造反学生打解放军之类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无非要把我们先来的千余名红卫兵搞臭搞走，而留下这四百名只宣传的红卫兵。”

回内地的火车上，H感觉他们被监视，被歧视：“找我们要喝水钱，饭费和普通旅客一样，真是气死人！”

在广州，他们收获甚少。“这里的斗争没有西北地区激烈，也没有什么事件之类的，各校材料极少，学院里平平静静的，走到路上也是平平静静的，回到住处仍然是平静。”“指望着像在兰州、西安等地那样大批大批地往回邮材料是不可能的了。”

回京后，H首先面临批斗的压力，因为是擅自参加“大串联”，他一路上颇为忐忑，听说要挨批判，他自忖“串联无罪”，“多少人都可以，我不怕什么！”他就写了一个声明：不承认本班“文革领导小组”，一切行动由自己做决定。他决定退出这个束缚手脚的组织，自己解放自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H估计自己的家很可能让人家给抄了，“不然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寄钱？”

“大串联”归来，发现班里女生“不理自己”，H愤然写道：“干革命是不怕孤立的！”

返校四天后，他和Z决定组建“莽昆仑战斗组”，从此摆脱班级“文革领导小组”。两人先写了一张《班领导小组靠边站》的大字报，接着写了一张名为《彻底批判工作组院文革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贴在校园里。

10月23日，H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写道：今天贴出一些大字报，观点就是觉得院文革工作组和红卫兵总部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已经把目光投向新一轮的洗牌风暴，问题是，他最后到底在残酷的厮杀中生存下来了吗？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枚卑微的棋子吗？黄雀之后还有黄雀，他能够通过持续的效忠被终结一切的黄雀接纳么？

如果他还活在人世间，目睹当下席卷神州大地的抗日游行示威，他是否会会心一笑呢？

□ 原载《金融时报》中文网

~~~~~

【峥嵘岁月】

省总工会武斗

• 叶曙明 •

1967年8月14日凌晨3时3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广州各群众组织驻京代表，其中包括工联、红旗工人、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红旗、新一司、三司、红警司等。他批评广铁总司8月12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动。他说：“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周恩来一再强调，“我们首先要解决广州的治安问题”。

8月16日凌晨4时1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第二次接见上述几个组织的驻京代表，他仍然强调：“广州一定要马上恢复革命秩序。”省军管会随即发出《告广州人民书》，要求各群众组织迅速交还抢夺解放军的武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根据中央指示，军管会要求红旗、东风两派，再派出主要负责人上京谈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却突然爆发了。

8月16日下午7时左右，一辆中卡从海珠桥方向，驶往省总工会。卡车上是工联和八一战斗兵团的人。在驶近总工会时，向天开了一枪。总工会大楼内是地总的一个分部。枪声一响，里面马上开枪迎击。双方对射了几分钟。

这是红警司成立后策划的第一次武斗，具体部署是，八一兵团从二轻大楼方向进攻，一批大、中学生从工人医院方向进攻，三司红旗兵团从海珠桥长堤方向进攻，海员总司负责封锁江面。旗派包围了省总工会，并全部控制了四周的制高点和附近的交通要道。枪战持续不断，警司多次派部队、联络员和救护车，都无法接近。

由于武斗发生在广州两派代表赴京谈判前夕，军区非常重视。陈德政委作出三点指示：一、警司立即派员去，弄清火力点在何处？有几处？火力点系何组织的？要与他们保持联系，做好工作。二、警司派员抢救该区的伤员。三、警司对上述执行情况，如实汇报。陈青山副主任也指示：请各组速通知各线宣传员、联络员，找各个组织的头头，做好工作，好好谈一谈，要把总工会这个点的武斗制止下来。

18日晚上9时，省军管会向北京告急——

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并转黄永胜同志：

近三日来，广州市“工联”和住省总工会的“地总”发生枪战，双方都有伤亡。“工联”已占据总工会附近的几处制高点，并控制了周围的要道，今晚工联已紧缩了包围圈，通过广播要地总人员全部撤出，交出武器。“地总”的六十余人，表示与大楼共存亡，警司派人调解无效。为了避免继续流血，立即制止事态的扩大，我们除继续做工作外，特建议，中央文革给有关方

面来电话指示，或转告双方在京的负责人紧急处理。当否，请示。  
广东省军管会 1967年8月18日21时

总工会内的地总频频用电话求援。19日零时5分的电话称：“我们可能最后一次打电话，旗派打炮，电灯全部熄灭。情况紧急，要求派部队求（救）援。”另外有一个没有记录人姓名、时间、事由的电话记录，用红笔龙飞凤舞地写下：

部队派出否？

军管会采取什么措施？

王：部队派不出，接近不了，这里无办法。向北京报告，未表态，首长已走。到处戒严，根本进不去。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19日零时以后，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二轻局方向首先打了三枪，各火力点一齐开火。省军管会一份综合材料记载：“到19日零时20分，工联发起总攻。使用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炸药包。打讯号调增援队伍，据查还有中大红旗、三司、华工红旗等组织也参加了，约千余人。到1点30分左右，工联等组织已冲上四楼，地总已退到五楼（最后一层），现正通过广播做瓦解工作？？地总分部人也表示要与大楼共存亡，该总部也要采取行动，现事态正在发展中。”

凌晨1时05分，陈德亲自给警司打电话，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1时15分，总工会方向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一股浓烟翻滚着升上天空。一共是六个炸药包爆炸。

3时15分总工会内的地总打电话给工交组，问军管会究竟是什么态度，再不采取措施，他们就要与大楼共存亡，用炸药炸毁大楼。工联已经攻入大楼了，并在楼下纵火，想把楼上的人逼出来。

据当事人回忆：攻打省总工会的人，很有作战经验，这批人打，掩护另一批人冲上前；这批人上去了，再掩护后面的人冲上前，这样作梯级前进，一排排地打枪，一队队地逼过来，是有作战指挥的，不是乱哄哄地嚷着“打总工会”就乱冲乱打的。

19日凌晨，周恩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撤走攻打总工会的队伍。广州军区派了大批解放军到总工会解围。中午11时，地总、春雷开来了三车援兵，冲进总工会内，登上顶楼，架起两挺机关枪，瞄准工人医院方向。11时33分，双方各种轻重火力一齐射击，枪声震耳，弹雨横飞。地总有几千人从河南经海珠桥，向海珠广场集结，举行游行抗议。队伍走到靖海路，遇上旗派的人，双方又打了起来，群众争相走避，互相践踏，一片混乱。

下午4时8分，部队突入总工会，把地总人员全部接出送走。当夕阳在珠江泛起粼粼波光时，省总工会大楼余烟缭绕，人去楼空。事件至此，暂告一段落。

□ 摘自《羊城晚报》网络版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八）

• 孙怒涛 •

〔上接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的外战和内斗（1 9 6 7． 6—1 9 6 8． 9）〕

第二十二节 1 • 4 武斗，我拿起竹竿当长矛

仓促上阵

1 9 6 8年元旦刚过几天，两派之间发生了1 • 4 武斗。武斗地点在学生宿舍1 2号楼。我从入学开始一直住在该楼的四楼，所以这次武斗我是被撞上了。

刚刚经历了4 1 4战歌和陈楚三被抓放的事件，两派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对立情绪相当严重，但是我没预料到马上又会发生武斗。我的政治嗅觉向来是比较迟钝的。

1 9 6 8年1月3日晚上，我在主楼开会。会议结束，已近半夜，我一个人回宿舍。到八饭厅前，忽然发现前方有一团人，夜色下，分不清是十几个还是二十几个。他们戴着口罩，穿着棉大衣，有的正从1 1号楼出来，有的已经快到1 2号楼的东门。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在这里出现这样一群形迹可疑的人？我顿感蹊跷，当即改变路线，绕到1 2号楼西门进楼。到2 2 7 / 2 2 9“红尖兵”广播台，见但粦（自9）等人在，还未睡觉。我对他说了刚才路上碰到的情况，说今晚要多加小心，很可能会出事情。才谈了大约一刻钟光景，忽听得从楼上传下来暖气管的击打声。不一会儿，从各处房间里发出来的击打声大作，响成一片。但粦说：“糟了，楼上真的出事情了。”他赶紧跑了出去。

我对于1 2号楼究竟有什么值得团派要来偷袭的，茫然不知。我的精力和兴趣一直是在学校里，对于系里、年级里和班里的事情极少关心，几无过问，知之甚少。即使对同班的同学，大概只有三分之二我分得清谁是老团谁是老四，有好几个人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老团还是老四。4 1 4每个系的学生分部，一般都是一个年级推举出一名负责人，六个年级的六名负责人组成分部。4 1 4自控系的分部委员我认识几个，也没认全。如果说4 1 4的总部委员也算是一个“官”的话，那我这个4 1 4的二把手也真够“官僚主义”的了！

楼道里全是闹哄哄的叫嚷声和脚步声。我班里已经有不少人毕业离校了，还有一些人准备在最近几天离校。有人告诉我，各个班的老四已经把本班的老团都赶在房间里，警告他们老老实实地待着，不要到处乱走，要是到楼道里去，会吃苦头的。我听说，有个别不老实待着的老团，真挨了几下打。就这样，老四把整个楼道控制起来了。

至于老团怎么偷袭的，老四怎么抵御的，我都不清楚。自控系的分部委员们都很有组织能力，他们既没有向我这个“上级”“请示汇报”，也没有像对待小兵那样的分派战斗任务。更有意思的是，当我看到同班的老四都忙进忙出的，我问他们：“我做点什么？”他们居然说：“你还是待着吧！”看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安排我做什么。小兵都在忙乎，倒是要我这个头头到边上凉快去。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从来就不适合做指挥或当小兵似的。我也不生气。因为我知道我既没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不熟悉4 1 4自控系分部的人员、组织及准备情况。

楼道被4 1 4控制，一楼的楼梯和通到五楼的楼梯都被堵住了。我就在中间的几个楼层各处走走，问问情况，有时也去2 2 7室转转。我好像是一个夜游神似的，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点什么？该去哪里？

大约几十分钟后，当时我正在2 2 7室里，忽见窗外有一个黑影从上往下掠过，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声闷响。不一会儿，又见一个黑影摔下。楼外围着的人见有人从楼上摔了下来，都

赶紧跑过来，把人架走了。我想，这跳楼的肯定是老四。问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说很可能是从五楼跳下来的。

我吓呆了，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完了！肯定死人了！从五楼跳下去，哪有不死的道理？

我心中无比悲痛，无比气愤。拉过话筒，带着哭腔在广播中通报了两位同志被团派攻打被迫跳楼牺牲的消息。我还声嘶力竭地高喊口号：“为死难烈士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我的心里真的是难受到极点，麻乱到极点，老是不停地念叨：“怎么会这样的呢？怎么会这样的呢？”

后来，听说老团正在不断地攻楼。有一个人，可能是分部委员吧，把我带到二楼西头，说，你守这里吧。于是我与其他几个老四守在这楼梯口。

一楼是无法防守的，因为有太多的窗户，按照预案早已放弃。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上，塞满了双层床、桌子、椅子等杂物，用以阻止老团沿着楼梯往上攻。

老团要爬行钻过这些障碍物是很困难的。但是老团很顽强，在水枪的掩护下，不怕水淋，手拿铁棍一点点的往前挪动。

我们拿着拖把等物挥舞着阻挡他们，驱赶他们，还拿皮管的水滋他们。大冬天的，水冰凉冰凉的，浇在身上肯定很难受，但还是挡不住这些老团前仆后继地往上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急着想去救援五楼的老团。

我找不到好使的家伙，两手空空的，心里想着阻挡他们，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终于找到一根短木棍，拿在手里似乎比什么都没有要强一些。

老团拼命攻，我们这几个守楼梯的老四没敢下重手拼死命阻挡。几轮进攻以后，老团终于攻上了二楼。眼看抵挡不住，我与另一个老四，赶快退守到227 / 229套间里。

一进房间，我们赶紧关上门，顺手拉上一张上下铺的双层床顶上。

听到有人在外面撞门。我们在里面用力顶住双层床。有床铺顶着房门，外面的人想进来是很困难的。

撞了一阵，撞门声没有了。过了一会儿，有个脑袋瓜子在气窗上冒头往室内探视。他肯定是脚下垫了凳子之类的东西才爬得那么高的。

他向下看见了我们，我们抬头也看见了他，就这样对视着。因为有床铺顶着门，所以我心里并不是很害怕。

一忽儿，一根长矛从气窗上伸了进来，他想来刺我们。我们见状，赶忙找室内可以抵御的东西。我拿起挂蚊帐用的竹竿，另一老四拿起拖把，与他的长矛对打。好在他的长矛够不着我们，更重要的是他站在上面从气窗里伸进来的长矛施展不便，无法发挥这件“武器”的有效威力。我们站在长矛的威胁圈之外，只用竹竿、拖把打他长矛的端部，与他纠缠厮打。

这样对打了一阵以后，他见奈何不了我们，又去拖来一根水管，可能就是刚才丢弃了的那根皮管。他用手捏扁了水管口，一股强大的水流从气窗上方滋进来，对我们发动“水攻”。我们的竹竿和拖把顿时失去了抵抗作用，只好赶快躲在床背后，躲在远处的角落里，靠着墙壁从侧边用竹竿去干扰他，不让他专注、直接地来喷射我们。即使这样，我的头上、脸上、身上、

尤其是眼镜片上都被滋了不少水。趁间隙，我随手拣了一条毛巾在头上扎了一个兜，活像陕北放羊的老汉扎在脑袋上的那种白羊肚手巾。

我退守的这间套间似乎并非是团派非得攻下来的要地，所以门外的一两个老团好像也没下力气花功夫铁了心攻门。除了交替使用长矛和水管以及有时候使劲撞几下门之外，他们也想不出破门的更有效办法。这样，我们与门外的他们经常处于半战半休状态。当然，我们一点也不敢懈怠，时刻准备着对老团的进攻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紧张的对峙，好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我只听得12号楼外面一直有很嘈杂的人声。武斗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一无所知。

我们的方针是坚守待援。即使外面好长时间不来进攻了，我们也不敢拉开双人床开门看看动静，害怕老团正等待着我们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等到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听外面有人喊，解放军来了。一会儿，有老四来敲门。于是我们移开双层床，打开门。来人告诉我，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来制止武斗了，武斗已经结束。

谈判负伤

解放军要求两派谈判解决争端。

我是总部委员的身份，以及我是自控系的学生，又亲历了武斗，这就决定了我责无旁贷的要作为414的首席代表参加谈判。

我们要求就在12号楼里谈判。因为此刻的12号楼由414控制着，在这里谈判才安全。团派要求在11号楼谈判，因为11号楼是电机系老团的势力范围。他们想在他们的地盘上谈判，想法与我们一样的。为谈判的地点，双方争执不下。

制止武斗的解放军见团派绝不让步，把这视为原则问题，解放军只好来劝说我们。他们说，现在的12号楼是武斗现场，打成这个样子，满地是水，好多桌椅都在楼道里，不适合双方的谈判，要我们去11号楼谈判。我们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好在有解放军在，我们也不担心了。于是就对解放军提出要求：必须保证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才能去。解放军承诺了。我们五个谈判代表，跟着几名解放军战士去11号楼。我走在最前面。

11号楼在12号楼南面，相距也就是二十米左右。我出了12号楼西门，看见11号楼西门门口聚集着不少人。

快走到11号楼西门的时候，楼上的老团从上面的窗口砸下东西来。有石块，有墨水瓶，有鞋子等杂物。我用双手抱着头弓着腰走。突然，我的额头被一件硬东西砸中了，眼镜也被砸得从鼻梁上滑了下来，挂在一只耳朵上。说时迟那时快，紧靠在我身旁的一位身材高大的解放军战士张开双臂呼的一下扑上来，把我的脑袋压在他的咯吱窝里，大步推着我走了几步，护着我进到11号楼西门。我听到他身上也有被东西砸中的声音。好在这一段路只有短短的几米。老团也只是泄愤，并没有拿特大特重的家伙往下砸，怕出人命。

进到楼里，我从那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挣脱出来，感觉额头上有点痛、有点热、有点湿，用手一摸，是血。原来右额被砸中了，砸破了皮，砸出了血，所幸没正中砸到脑瓜上，没砸成脑震荡。我就让血花挂着，也不去擦掉，想等一会儿与团派谈判时作个证据，讨个说法。

谈判的地点在11号楼三楼东边那间套间里。到了那里，我才认出掩护我的“解放军战士”

原来是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李钟奇将军！

李钟奇肯定认识大名鼎鼎的蒯司令，知道响当当的清华“井冈山”。我想他很清楚中央文革对蒯大富对清华“井冈山”的态度。幸好，他这次来清华只是奉命制止武斗，并非是对这场武斗的是非曲直来作裁决的。

“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规矩。作为一个军人，他更晓得。清华这次武斗，既非两国交战，砸谈判代表也远没有“斩来使”那那么严重。但是，公然在他的眼皮底下砸谈判代表，挑战他对414的承诺，这已经超越他容忍的底线。耿直的他顾不了那么多情面。当两派谈判代表都到齐以后，他对团派训开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不守信用的呢？怎么可以把谈判代表都砸了呢？”

老团的代表面面相觑，脸上无光，不敢吱声。这理亏是明摆着的，还有什么好辩解什么呢？

我知道，这只是极个别老团的过激举动。但是，就是这样只顾一时痛快的行为将自己这派的谈判代表陷于尴尬、难堪的不义之地，在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将军面前颜面扫地。于是，我觉得我所挂的这点小小的花，实在太值得、太划算了！

李钟奇指责了一通团派以后，看着我额头上的桂花，一只大手拍拍我的肩膀，神色深情、声音凝重地说：“砸在小将的身上，疼在我老将的心里啊！”

我一听到他说这样的话，顿时感动万分，热泪差一点夺眶而出，不能自己。四十余年以后的今天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当时他说这句话时候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让我心里热辣得很。

李钟奇将军自比老将，视我们为小将，危难的时候首先保护我们，如同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他自己身上也挨了砸，全然不顾，只想着制止清华两派武斗是他这次来的使命。

即使有李钟奇在，两派代表仍然互相指责对方挑起武斗，造成己方人员重大伤亡。414说武斗发生在12号楼，来攻打的老团都是外系的专业武斗人员，不是团派挑起的又是什么？团派有点理亏，但是仍然争吵强辩。李钟奇一看，不强压不行。就说，你们双方必须立即停止武斗，达成协议，否则由军队接管。这一压，果然见效，双方态度软化了不少。李钟奇命人按他的意思当场起草了协议，让双方代表马上签字。协议如下：

清华两派停止武斗协议书

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上午，在卫戍区李副司令员亲自主持下，由团派和四一四派，各派五名代表，就停止武斗问题进行了协商，已达成如下协议：

- 一、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抓的人无条件释放。
- 二、停止武斗后，保持原状，不得再发生武斗，事态不准扩大，保证四大自由、人身安全。十二号楼427、429，527、529号两个房间由卫戍区封闭，听候处理。
- 三、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斗工具，由解放军接收。双方解散专业武斗队。
- 四、双方不准利用广播进行互相攻击。
- 五、解决武斗，主要靠毛泽东思想，双方都要自觉地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斗私，批修”，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
- 六、以上诸条，由解放军监督双方，坚决执行。武斗停止后，谁再挑起武斗，要负完全责任，承担一切后果。

团派代表 鲍长康（签字）

四一四代表 钟成国（签字）

1 9 6 8 • 1 • 4

协议写好双方看过认可以后，先由团派的谈判首席代表、他们的二把手鲍长康签字。轮到4 1 4签字的时候，我们小声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自控系分部主要负责人钟成国（自7）代表4 1 4方面签字。一来是以此突出是团派来攻打1 2号楼的4 1 4地盘的。二来是为了故意矮化团派：4 1 4在与团派的多次谈判中，处处要争对等，显平等。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与鲍长康对等的应该是我。但是这一次我不签字，让钟成国签字，是要耍的一个小心眼、小花招。果然，协议达成后，听说鲍长康在老团那里挨了“骂”，说他不该与4 1 4的一个分部头头一起签字，太不对等了。鲍长康本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只因为是他先签的字，明知吃了点亏也没办法了。

同样是这位号称“救火队长”的李钟奇将军，他在七二七那天也来清华制止武斗了。只是，这一次他所经历的就没有1 • 4武斗那次那么幸运了。团派“扣留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的汽车、司机和公文包。”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说肯定是很不愉快的。

过程回放

关于1 • 4武斗，我从4 1 4方面了解比较容易，也了解得比较详细。团派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就不够详尽。我从但燊（代表自9年级的4 1 4分部委员）、郭创贤（代表自0年级的4 1 4分部委员）、钟成国（代表自7年级的4 1 4分部委员、自控系分部主要负责人）、崔兆喜（团派总部委员、保卫组负责人、团派1 • 4武斗现场指挥）等有关当事人了解到的情况，1 • 4武斗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自控系从学生到教师，大部分都是4 1 4的，尤以自9、自7、自0这三个年级更强，是4 1 4力量最强的系之一。1 2号楼是自控系男生的宿舍。1 1号楼是电机系男生的宿舍，团派的力量占优。

武斗的直接起因是团派偷袭自控系4 1 4的“红尖兵”广播台。

这个时候的清华，团派已经有三个广播台，4 1 4有两个广播台。团派总部领导的广播台设在明斋，4 1 4总部领导的广播台设在科学馆。这些总部的喉舌，都是影响很大能够覆盖全校的广播系统。由团派激进分子在一教开办了代表鹰派观点的“前哨”广播台，广播的内容观点极左，用词偏激，语气火爆，影响很大，在派仗、武斗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恶劣。4 1 4没有相类似的广播台与之抗衡。1 1号楼的电机系团派有一支骨干队伍“捉鬼队”，因在“智擒王光美”中大显身手而闻名清华。电机系的团派办了团派中唯一一个系级广播台，足见其实力的强大。这个取名为“太阳升”的“地方台”，水平比总部直属的广播台要差多了，广播的文章多数只是谩骂式的攻击和派性口号。“太阳升”的影响范围只在东区学生宿舍楼一带。对着1 2号楼的喇叭日夜高分贝的骚扰，害得1 2号楼的自控系老四（也包括自控系老团）苦不堪言。于是，有几个自控系老四自发办了一个“红尖兵”广播台，与“太阳升”针锋相对唱对台戏。“红尖兵”广播台得到4 1 4自控系分部的支持，4 1 4总部对此当然也是乐观其成的。只是，水平也很有限，同样是派性十足。就这样，“红尖兵”广播台与“太阳升”广播台，针尖对麦芒似的，谁也不让谁。两个广播台的喇叭，你方唱罢我登场，日夜扰民，苦了东区所有的学生们。

架在1 1号楼的喇叭对1 1号楼自己的影响比较小。现在架在1 2号楼的老四的喇叭正对着1 1号楼，1 1号楼的老团就受不了了。他们必欲除去这根眼中钉肉中刺而后快。此外，因

为在414战歌事件中没有捞到什么好处最后铩羽而归，团派心中有气很想报复一下414。我想，这些都可能是引发1·4武斗的原因吧？

12号楼是一幢五层楼的学生宿舍，每层楼中间是一条东西向的长长楼道，南北两边是宿舍。两头的北面是卫生间和盥洗室，南面是成套间布局的两间宿舍。楼的东西两头各有楼梯上下。“红尖兵”广播台的广播设备安放在二楼的西南套间227/229，广播线从二楼沿着外墙连到架设在楼顶的喇叭。从二楼到五楼的各层套间都住有老四，便于守护线路和喇叭。

1968年元旦前后，有人向414自控系分部反映，说有几个彪形大汉在12号楼内外转悠，形迹可疑。其中有一个是自9的。他是体育代表队的，平时不回12号楼住，现在是团保卫组的。这引起414自控系分部的严重警惕。他们分析认为，团派对12号楼感兴趣，一定是冲着广播台来的。经研究后，他们作出决定并有预案：

1、派人防守527/529套间。因为这个套间里住的六字班学生已经毕业离校了，现在空无一人。于是决定各年级派五六个老四轮流值守527/529套房，确保广播台线路和楼顶喇叭的安全。

2、若有团派来袭，立即敲打暖气管。暖气管各个房间各楼层相连，声音可以传递很远，比在楼道里喊话管用得多，算得上是一项古时烽火台、抗战时消息树的清华版应用。

3、若团派来袭，各层楼的老四应立即用床、桌子等把楼梯堵起来并把守。阻止更多的老团前来攻打。

4、自控系的老四手无寸铁，是抵挡不住团派保卫组进攻的。为此，但桑专门找到宿长忠，请求他在12号楼出事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带人赶来支援。

电机系的团派听说自控系的414把五楼西边空出来的套间抢占了，心里很有气。对“红尖兵”广播台，心里更有气。砸掉广播台，教训教训414，出出心头的恶气。想法就那么简单。负责团保卫组的崔兆喜是电9的学生，“捉鬼队”与团保卫组的联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这次行动有没有经过团派总部的研究和同意，这点存疑。

团派的保卫组早就成立了。绑架414干部，抄抓414头头，冲击会场等等都是他们干的活。保卫组里很大一部分成员来自校体育代表队，个个高大彪悍。414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类似机构，所以吃了不少亏。沈如槐意识到两派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而且逐步升级，没有自卫能力是不行的。于是由宿长忠负责，组建了“李文忠学习班”，以便应对突发冲突事件。

527/529套间第一天值守的是自9的老四，当晚无事。第二天由自0的郭创贤、江道波等6个老四值守。

夜半时分，团派先派人潜入12号楼察看，发现全楼学生多已就寝，并无异常。于是用手电向11号楼的老团发暗号，表示可以开始行动。团保卫组一行十余人蹑手蹑脚从东门进入12号楼来到五楼527门前，开始破门进攻。遭到偷袭的值班人员立即敲打暖气管报警求援。

在227/229套间里值守的老四立即开启“红尖兵”广播台，用大喇叭呼叫“李文忠”学习班前来自控系救援。团广播台立即播放音乐干扰，瞬间就把“红尖兵”的求救声给压了下去。科学馆、主楼等地的老四根本就听不到“红尖兵”的广播声。周边楼群的老四知道12号楼出事了，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情况不明，又一时难以组织人员，所以，只能由自控系的老四独自应战。

除了派人到主楼等地去找宿长忠外，414自控系各分部委员指挥各个年级的老四分头行

动起来。自9的老四马上用床和桌子堵住了东头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自8的老四也用床和桌子堵住了西头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接着，但桑带了几个自9的老四从东头冲向五楼。住在四楼的几个自7的老四已经先行冲上了五楼。他们看到楼道西头有十来个人高马大的团保卫组的人，头戴刺杀面具（击剑代表队运动员专用的防护面具），手执长矛、长棍。这些人，一部分正在猛烈砸打527 / 529套间的门，还有几个人手执长矛面对着从楼道东头来的老四。西头四楼通向五楼的楼梯已经被他们用木床和桌子堵住，以防414从西头四楼往上攻。此时，五楼东边的楼道里已站满了老四。虽然414在人数上占压倒的优势，但是老四手无寸铁，几次试图冲上前去为527 / 529套间解围，那些老团只要抖一抖手里的长矛，就被逼退回来了。但桑等人除了责骂老团，毫无办法，只能等待宿长忠的援兵。老团对楼道东边的老四只实施警戒，并不反攻，正在集中力量砸打527房门。由于房内用木床顶着房门，老团一时也无法攻破。久攻不下，他们打开楼道西头墙上的消防水龙头，向527房里喷水。这下提醒了但桑他们。老四也打开楼道东头的消防水龙头向老团喷去。老团调转水龙头与楼道东头的老四对射，两支水枪打开了“水枪战”。大部分老四躲进两旁的房间避水，老团本来也可以躲进西头北边的盥洗间的。因为他们要急于攻下527，就顾不得躲避老四的水枪了。十来个老团全部集中在527房门外的一块窄小的楼道上，被水龙头淋得透湿。

但桑他们望眼欲穿，焦急地盼望着救兵快快到来。熬过好一段时间，由宿长忠亲率的“李文忠学习班”十来个人，通过东边楼梯来到五楼。

虽说“李文忠学习班”是414里最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比起团保卫组，装备上还是差得太远了。他们既没有长矛这样进攻武器，也没有面罩这样的防护器具。比自控系老四强一点的是手里有一根一尺左右的短铁棍。老团武斗人员见来的是这样一支援兵，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宿长忠他们面对手持长矛的老团也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楼道里又出现僵持局面。

这个时候12号楼的武斗态势，是一种团派与414之间复杂的包围和反包围交叉、内线与外线层叠的类似于“三明治”的局面：

处于最内线的是郭创贤等值守人员。他们既没有任何反击能力，也没有退路可逃。527房门已经被长矛、铁棍砸开一个大洞。几个老四躲在床背后使劲顶住不让房门被撞开，还有几个老四拿着竹竿与伸进来的长矛对刺。他们的处境最危急，只能固守待援。

郭创贤他们的外线是团保卫组。团保卫组包围着他们并全力在向他们进攻，又被“李文忠学习班”所包围，不得不戒备防守。团保卫组的处境也有点不妙。

再外线是宿长忠他们。他们包围了团保卫组，离解救目标近在咫尺。但是前进不得。如僵持下去，危险性会越积越大。因为，如果团保卫组攻破527，解决战斗，就会转过身来全力以赴对付他们，他们定要吃大亏。另外，如果楼外的团派增援上来，他们也将腹背受敌，必招致全军覆没。这两种情况只要发生一种，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外线的是在12号楼外面赶来救援的众多老团。“团总部崔兆喜、鲍长康、马小庄、刘才堂、陈继芳等人”悉数到场。他们知道团保卫组已经攻入12号楼，但在楼内被414包围起来了。他们组织力量从一楼向二楼往上攻，但是楼梯已经被堵死，二楼还有老四拼命守卫，老团人数再多，也施展不开手脚，上攻与保卫组会合的难度极大。

12号楼外面也有众多的老四。只是因为没有组织，无人指挥，形不成战斗力，又不明情况，只能干着急，形同观战。

时间在一点点地流逝。无论是在外线还是内线上的老团或老四都在尽力突破僵局，把胜利的天平扭向自己这边。

终于，在五楼楼道出现了转机。有几个老四从房间里拖出一张双层床，竖起来，床板对着老团，几个人躲在床板背后推着床向前滑行。这无疑是一张巨型的盾牌。盾牌后面跟着几个老四手持消防水龙向老团射水。一时间，五楼的老四喊声震天，一下子就冲到老团面前。老团的长矛在这盾牌面前失去了威力，也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还没等老团反应过来。经过一阵短暂的搏斗，在楼道里的这几个老团全被缴械俘获，赶进了盥洗间。

正当宿长忠、但燊他们庆幸解围终于成功，进入 5 2 7 / 5 2 9 套间，发现就在几分钟之前，郭创贤和江道波已经从五楼摔下去了，生死不明。

原来，就在宿长忠他们想法突破团保卫组防线的时候，团保卫组的另几个人也正在想法突破 5 2 7 的防守。他们看到从房门无法突进，就想法爬上楼道天窗进到五楼上的架空层，在 5 2 7 的天花板上砸开了一个大洞，用转头砸向郭创贤他们。郭创贤他们能抵挡从正门的进攻，却无法抵挡从房顶自上而下的攻击，只好逃到 5 2 9 里间。

四楼 4 2 7 / 4 2 9 套间里的老四从楼上的打斗声中感觉五楼的老四可能快坚持不住了，就着急地向上喊话，要五楼的老四抓住广播线顺墙往下撤到四楼。五楼这几个老四建议郭创贤先下去，因为他是分部委员，被老团抓住一定会吃大苦头的。其余的人都是一般的 4 1 4 群众，估计即使被老团抓住也不会受太大的伤害。郭创贤起初不肯，但是情况越来越危急，老团很快就会从天花板洞里钻下来。郭创贤同意下去，但他还是叫江道波先下。江道波在慌乱中抓住广播线往下滑，广播线太细了，一双湿手根本就抓不牢，他滑了一小段便摔下去了，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郭创贤以为江道波已经平安滑进四楼，也抓住广播线往下滑。他的湿手也同样抓不住，摔下去了。只因为他在下跌的过程中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弹开了一点，才没压在江道波身上，要不江道波不摔死也得被压死。第三个姓姚的老四用牙咬住广播线，双手紧扣住五楼的窗台边，双脚探到了四楼的窗户，由四楼老四抱住得救了。就在这时，老团从天花板的窟窿里跳下，抓住了剩下的三个老四，一顿暴打，其中姓戴的老四更被打得头破血流。

就在 5 2 7 房间里的老团对抓获的老四施暴的时候，门外的老团也成了老四的俘虏。当他们听到有两个老四从楼上摔下去了，看到没逃走的老四被打得脸青鼻肿流血，顿时热血往上涌，怒火从心生，非常气愤！有一个“李文忠学习班”的老四对着一个没戴头盔的老团当头就是一棍，也流了血，开了花。

唉——就差那么几分钟！如果宿长忠他们早来几分钟，如果老团砸开天花板晚几分钟，如果郭创贤他们再坚持几分钟，就不会发生从五楼摔下去的不幸了，对各自俘虏的施暴也不会那么厉害了。

从团派武斗人员开始攻打 5 2 7 / 5 2 9 套间，到他们全部被 4 1 4 俘虏，历时约两个小时。天还没有亮，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就来了，武斗基本结束。

当江道波、郭创贤从五楼摔下来的时候，1 2 号楼的楼外有不少东区的学生。有老团，有老四，也有来围观的一些人。一看到有人摔下来了，不管摔下来的是老四还是老团（当时天黑无从判断），好几个人都跑上前去救护。江、郭二人被何人救起、如何送到北医三院，详情已经无从考查。我在这里要说一声：谢谢救护他们的同学们！

余波涟涟

谈判协议墨迹未干，口舌之战迅即再续。两派各自召开大会，说明武斗真相，攻击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两派的广播台更是隔空交战，各不相让。

我亲耳听到团派在广播中公布了这么一则爆炸性的新闻：“孙怒涛手执长矛参加武斗，在我英勇的井冈山人面前戴起花头巾，乔装逃命，狼狈不堪，丑态百出。”

几个月来，4 1 4 早就习惯了团派的造谣。对于团派的谣言，开始时我们还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辟谣。后来，造的谣越来越多，前一个谣言还在发酵，新的谣言接踵而至，简直是辟不胜辟，于是也就随他去，不再花精力花时间辟谣澄清了。4 1 4 群众经过多次谣言的轰炸，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神经也有点麻木，习以为常了。对于一般性的谣言，不再要求总部澄清这澄清那的了。

这个涉及我的最新谣言，我也一笑了之，不加理会。也没有老四问我这是不是真的。曾听到有一个老四这样说：“老孙像一根麻杆儿，要是戴上花头巾，那样儿岂不是比狼外婆更吓人？”

原以为4 1 4 是本分老实不造谣的。若干年以后才知道，老团也一样认为老四造老团的谣造得满天飞，对老四的造谣极其反感的。于是，我想到，原来两派都是会造谣的，造的谣都不少。只是因为我身处4 1 4，对老团的造谣很敏感。老团造4 1 4 的谣言，我一般都知道真相如何，所以一听就知道这是谣言。而对于4 1 4 造团派的谣，我不敏感，不知道哪些是4 1 4 造了团派的谣了，也不知道团派的真相究竟如何。我想老团对4 1 4 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敏感对方造自己的谣，不敏感自己造对方的谣。

两派派战中，完全无中生有的谣言也是有的，但我想，大多数应该是那种加油添醋的谣言。譬如，有关我的这则新闻，起码有三点是有影子的：1，当时门外的老团确实认出我来了。2，确实看到我当时头上扎了一条毛巾了。3，确实看到我手里拿着一根东西了。这三点是事实，没造谣。至于我手里的竹竿变成了“长矛”，我头上扎的毛巾变成了“花头巾”，是门外的老团看走了眼，还是在一人传一人的传话时走了样，我就说不准了。所谓“狼狈不堪，丑态百出”，那是老团的主观想象。对我这样的4 1 4 头头，只会丑化，不会往好的方面想的。最后那个“乔装逃命”，那是老团“合理”的推断。所以，关于我的这则谣言，是有点影子，加上误传，添点想象，加上推断而出笼的。

两派在派战时候的造谣污蔑，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有真有假、真真假假的派性炒作，满足一下派性发作时候的精神需求，犯不着当真、生气的。

探望伤员

受伤的两个老四躺在北医三院。作为同一个系的同学，我应该去看望他们。作为4 1 4 的头头，我必须去看望他们。

刚刚发生过陈楚三被绑架的事件，接着又发生了1·4 武斗，我作为谈判代表还挨了砸。原以为老团对我会比对沈如槐等“东方红战团”头头客气些，现在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老团对我也一样很恨的。所以当我提出要去医院探望伤员的时候，总部的人都很不放心，担心我半道上被打或者被绑架。但是我决心已下，一定要去。总部没法，说给我派一支小分队保护我。我觉得那样一来太招摇、太小心过分了，而且会被团派瞧不起的。最后，有人递给了我一件“武器”：一根约三十公分长、手指那么粗的铁棍用以自卫，再给我派了一名临时“保镖”。

说实在的，我从小到大从来没人打过架。据说，一个男孩子要是没人打过一次架，算不上爷们的。我身上确实没多少男子汉的气概，胆子比较小。现在有了这段铁棍，似乎壮了不少胆。对付一个人的空手袭击，我比划着招架一下，争得逃跑的时间，不至于马上就束手就擒，这点自信还是有的。我把铁棍藏在袖子里，外人看不出来，蛮隐蔽的。指派给我做保镖的人，我一看，原来是我系的车间工人，我认识他，叫小关师傅。我对他说，你不必贴身跟着我，与我保持五十米左右的距离远远跟着就行了。要是老团真的绑架了我，你别来救我，赶快跑回总部去报个信就行。

我与小关一起上路了。出东南校门，到五道口，经四道口、北航东门去北医三院。我不时往后瞧瞧，见他不紧不慢地跟随着我。快到医院门口时，我觉得已经比较安全了，就跟他扬扬手，示意他可以回去了。

受伤住院的两个老四，一个叫江道波，一个叫郭创贤。江道波腰椎骨折，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痛苦不堪。郭创贤掉下来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也受了不轻的伤。两个人从五楼摔下没有摔死，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一想到江道波可能瘫痪，才二十出头，今后的人生都得躺在床上、坐在轮椅上度过，我心如刀绞。此时，我只能用苍白的问候安慰几句。我心里暗想，要不是我搞4·1·4，他们不至于会那么悲惨的吧？一种负罪感立时涌了上来。

我很想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跳楼的呀（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并不是跳楼而是想逃到四楼去而摔下来的）？那是五楼，跳下来是要摔死的呀！就让老团抓住当了俘虏，最多是一顿毒打，也不至于被打死或者打伤成现在这样呀！但是我最终也没敢把这样的话出口。他们都伤成这样了，我这样的话里似乎有责怪他们跳楼的意思，于情于理都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后来郭创贤告诉我，如果老团只是在房门上方的气窗用水枪冲他们。因为有双层床顶着房门，房间里有六个老四，想攻入很难的。后来，老团在天花板上砸开一个大洞，老团从上往下砸砖头石块，他们就感觉顶不住了，想逃命。慌乱中根本来不及多想。

郭创贤毕业后先分配在东北，后调回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开了家公司，事业有成。我每次去深圳，凡与校友叙谈总要约他见见面，总要问问他的健康状况。面对着他，我时有一股内疚的感觉。看他各方面都很不错，很是欣慰。郭创贤说江道波在福建，他们有联系。我没有机会与江道波见面，只能请郭创贤代问一个好。2009年春上我去深圳，与郭创贤再次相聚。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他因病去世。听到噩耗，我十分悲痛。我总觉得那次武斗受伤，折了他好几年的寿命。每想到此，难受不已。

内心后怕

1·4武斗，与大半年前，即1967年4月15日4·1·4抢夺总部广播台那次事件相比较，有一些是共同的。譬如，这两次都是精心策划的，都是攻击对方的广播台，都发生了严重的肢体碰撞，都是一种暴力行为。

但是，显然地，1·4武斗比4·1·5冲突要严重多了（开始使用长矛、铁棍、面具、水龙等武斗器械）、规模大多了（直接对阵的有几十人，参与卷入的有几百人）、损失大多了（重伤数人、轻伤数十人，12号楼被打得一片狼藉）、影响大多了（卫戍区出动解放军来制止武斗，李钟奇副司令员亲自到场）。所以，如果说4·1·5事件是一次严重的冲突，那么1·4的性质就是一次大规模的武斗。

我已经分析过并承认 4 · 1 5 冲突是 4 1 4 挑起的，4 1 4 要负主要的责任。对于 1 · 4 武斗，我也明确地指出，团派挑起了这次武斗，团派要负主要的责任。

我一直想不明白团派为什么要挑起 1 · 4 武斗？要想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策划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关于后一个问题，在 2 0 1 2 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曾问起鲍长康。他说，总部确实没有开会策划 1 · 4 武斗。老鲍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由他来策划，绝对不会搞得顾首不顾尾地那么糟糕。但是，也有团派人士告诉我，1 · 4 武斗是由团总部策划的。多位团总部要员亲临现场指挥协调；远在西区的土建系老团在谢德明率领下攻入 1 2 号楼救援，这些都是明证。不管哪一种情况，这是一次由电机系团派联手保卫组想以突然袭击方式攻占自控系老四广播台的局部冲突最终演变成清华两派也是清华文革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武斗。

清华的两派，从动口发展到动手，从冲突发展到武斗。相隔时间不长，关系恶化迅速。

当我在房间里与门外的老团对峙的时候，我没感觉害怕。因为毕竟有房门隔着，他不能近我的身，我与他都没有实际的生命危险，所以不觉得是生死相搏。等到武斗结束后静下心来，我胡思乱想，倒是有点害怕起来。

我想，要是我与老团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用长矛对峙对刺，我还能这样淡定心不跳吗？要是真的要我选择如果我不刺死他他就会刺死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不愿、不想、也不敢将一个与我无血海深仇的同学刺死。我也不愿、不想、不甘心被人无缘无故地刺死。一想到今后可能会碰到这样极端两难的抉择，我的心在发颤。我不想举手投降，不想跪地求饶，我最大的可能是会选择向后逃跑。但是，真的能逃得成吗？在灌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宁死不屈，不当叛徒逃兵俘虏”的年代里，逃跑、求饶、投降都是可耻的，都是一件永远抬不起头永远会被人当作话柄的耻辱。如果在两军对仗的时候，我的临阵逃跑最后导致我的战友受伤甚至丧命，我的良心能安宁吗？我对万一碰上“刺人心不忍、被刺心不甘”的两难境地充满恐惧。这对我来说，是一道无解的题。

陈楚三被抓让我明白了 4 1 4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老四是安全的。1 · 4 武斗让我明白了死人的事情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这样的文革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懂了，越来越厌烦了。写文章我可以，台上辩论我也不怕。但是要轮拳头比力气，这不是我的所长，我既毫无兴趣，我也感觉害怕。

我的心正在离文革而远去……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 0 1 3 年 2 月第一版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